

這些並無關本書的主題。因為作者重在中西之間接觸與交匯的歷史景象，鮮明的視野及深厚的根基，使得他借着醫理藥物、人物場所一系列課題，將原本零零散散的、明顯帶有外來氣味的醫藥資料串成一片，並進而一步步呈現中西交通、社會醫療的各個片段。他的研究，讓中古時期豐富歷史進程的研討，多了新的依據。

肖 榮

深圳大學歷史系

### 任建敏，《從「理學名山」到「文翰樵山」——16世紀西樵山歷史變遷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462頁。

任建敏的《從「理學名山」到「文翰樵山」——16世紀西樵山歷史變遷研究》一書，嘗試以地域社會史的取徑，依據大量的文集和方志材料，跳出對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人的學術思想等問題的討論，將這三人的活動放入16世紀西樵山的發展脈絡中，探索三者在西樵山的歷史變遷中的作用與影響。按作者的話說，這「不是一本討論湛若水、方獻夫、霍韜這些歷史著名人物理學思想的哲學史一類的著作，而是想從地域社會史的角度出發，研究與西樵山關係密切的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公及其創立的西樵山四書院對西樵地方社會所產生的直接和間接影響」（頁461）。全書緣起於作者對由宋到清「羊城八景」的考證，進而發現了西樵山這一萬曆三十七年（1609）之後進入八景行列的地方。西樵山由寂寂無名到與羅浮山並稱，成為「南粵名山數二樵」中的「西樵」，這一歷史過程與湛若水、霍韜、方獻夫三人在此地的活動密切相關，其中又以四所書院的修建而較為顯著。圍繞着三人在西樵地方的活動，特別是以書院為中心，將三人與西樵山的歷史變遷相結合的討論，是本書中最为主要的內容。書院的建設為西樵山奠定了「理學名山」的地位，向「文翰樵山」的轉變也與書院的衰落有關。

全書正文共分為五章。從全書的篇章結構安排來看，第一章以「正德嘉靖年間的社會與禮儀變遷」為題，討論西樵山聲名鵲起的歷史契機，包括嘉靖年間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人相繼出山、珠三角的宗族建設、魏校的禁毀淫祠和正德嘉靖年間的講學風氣等問題。西樵山地位的上升與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人在嘉靖年間「咸獲登用」有關。從正德十六年（1521）到嘉

靖二年（1523），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人相繼出山，方獻夫、霍韜二人因支持議禮派而受到嘉靖皇帝的重用。在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上疏之前，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公就已經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開始了宗族建設。從正德十六年（1521）到嘉靖二年（1523）任職廣東提學副使的魏校打擊淫祠的行動，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公家族得以購買寺產，從中受益。而嘉靖十六（1537）、十七年（1538）兩次改毀書院的行動則對湛若水在廣東的講學活動沒有造成明顯的實質影響。

第二、三、四章討論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公的活動與西樵山的歷史進程。第二章作者主要依據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人及其後人文集中，涉及四所書院的文字記載和書信材料，以及地方志中的相關記載，對西樵山大科、雲谷、石泉、四峰四所書院的創修過程和建築景觀進行細緻的考證。作者指出，「確定西樵山四書院的確切興修事件及過程，是研究正德、嘉靖之際西樵山學風、士風、世風變化的重要時間及活動的座標參考」（頁66）。大科書院的名稱最早出現於正德十二年（1517），而書院主體則是在正德十四年（1519）才正式形成。雲谷書院最初名為雲谷精舍，只是作為大科書院完成之前從遊湛若水的諸生的棲息之所，此後因湛若水轉移於經營雲谷書院而暫歇；真正受到重視則是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其重返西樵之後。石泉書院至遲出現於正德十一年（1516）的石泉精舍，改名書院則是在嘉靖十三年（1534）御書樓建成之後。霍韜的四峰書院則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在對《石頭錄》及地方志等材料中有關寶峰寺、寶震庵記載的梳理後，作者理清了寶峰寺在嘉靖二年（1523）魏校禁毀淫祠到被霍氏購得的過程，指出了霍韜在這一毀寺買田過程中的曖昧形象。

第三章分析湛若水、方獻夫、霍韜家族的活動與西樵山的社會狀況。本章大體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討論三家與西樵地方社會的關係。茶業和採石業是這一時期西樵山的支柱經濟，官府對採石業的屢禁不止與霍氏等世家權貴參與其中有關。方氏家族則因田產問題與當地人民產生矛盾，方獻夫也因此嘉靖十一年（1532）兩次受到彈劾。湛若水則因參與地方鄉約建設等活動，留下的名聲比方、霍兩家要好。第二部份討論三家的宗族建設情況。分別考證了霍韜建立大宗祠、設宗子、建書院等建立宗族的措施，以及從書信中所見霍韜對四峰書院的管理情況，孔邊方氏的族源傳說與方獻夫時代方氏的宗族建設，和湛若水晚年對其家族事務的安排。

在第四章中，作者以湛若水為個案，討論他在西樵山時期的講學活動。按時間分為大科和雲谷兩個時期。在大科時期，作者以《西樵大科書堂訓

規》為線索，分析這一時期大科書院的運作，並對此時追隨湛若水的楊鸞、楊驥、霍傑等15人的情況進行追蹤。而在雲谷時期，湛若水步入晚年，除了增築雲谷書院外，也參與經營天階精舍等處。除此之外，在講學方面，洪垣是這一時期湛若水最重要的弟子。其出任巡按廣東御史期間，為湛若水的講學活動與著作刊刻提供幫助。而對於此後雙方長達八年的不通音信，作者通過利用湛若水的文集也進行了一些討論，指出其原因或許和當時湛若水家族產業經濟糾紛的流言有關。

第五章題為「從『理學名山』到『文翰樵山』」，涉及內容包括四書院與講學風氣的衰落，以及之後廣東士風、學風的轉變。三公之後出現了其事業的繼承人，湛若水的講學活動交付給了其弟子龐嵩，而方獻夫、霍韜二人的事業分別由其子繼承。萬曆初期張居正主持禁毀書院，大科、雲谷兩所書院被毀最嚴重，四峰書院也改作他用，加之龐嵩等人的故去，西樵山的理學風氣也由此衰落，四書院也逐漸被白雲洞、西樵雲瀑、三湖書院等景觀所取代，萬曆三十七年（1609），西樵山首次入選「羊城八景」。與此同時，文學之風漸起，成為明末至清初廣東地方的主流，至清初，西樵山已由「理學名山」變為了「文翰樵山」。

本書的一大特點是建立在文集和地方志之上的細緻考證工作。以第二章為例，作者首先通過文集和其他材料，建立了湛若水在正德十二年（1517）進入西樵山之後的活動歷程，由此確定大科書院的創修過程；對雲谷書院的考證過程也大致如此；又在對霍韜強佔寶峰寺的考證中，面對從明萬曆年間到現在流傳的四個版本關於霍韜強佔寶峰寺的故事，作者以霍韜的文集《石頭錄》為主，對故事中涉及的霍韜葬母等內容進行考證和辯駁，而對於故事中涉及的寶峰寺和寶震庵的先後關係，則是通過《永樂大典》、成化《廣州志》、康熙《南海縣志》、《西樵遊覽記》等地方志書中的相關記載，確定了二寺在洪武年間已存在，並非如故事中的有時間先後的繼承關係。

在本書中，作者嘗試將16世紀西樵山的盛衰過程與廣東士大夫的活動結合起來，展現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人與西樵地方發展的歷史脈絡之間的互動關係，大體上描述了從正德、嘉靖時四書院修建到清初的歷史變遷。本書中還有一些可以繼續討論的地方，如第三章討論湛若水、方獻夫、霍韜三公與西樵山地方社會的關係，作者給我們展現了對於採石這件事上霍氏家族的作為，但除此之外，霍氏家族與西樵社會的關係、霍氏家族在西樵社會中的其他活動也有待說明。作者對大科時期湛若水的弟子情況有所涉及，但對於他們在大科書院和西樵山地方社會之間的活動和影響等問題還沒進行探

討。至於第四章湛若水在西樵山的講學活動中，作者對大科書院的日常運作稍加論述，但所依據的材料比較單一，關於此書院對地方影響的分析也不夠深入。本書的工作還是以考訂史實與脈絡為主，其中相關的問題有待作者日後的研究。

牛 楷

中山大學歷史系

**楊國安，《國家權力與民間秩序：多元視野下的明清兩湖鄉村社會史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429頁。**

隨着學術界「眼光向下」的社會史研究動態，越來越多的學者將他們的注意力放在中國傳統社會區域研究上。但事實上，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學術傳統。傅衣凌、梁方仲等老一輩學者為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奠定的深厚基礎，讓社會區域的研究長葆活力。近年來，走向歷史現場，將文獻解讀與實地調查相結合的歷史人類學為學界所接受，並且取得了矚目的成績。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探索區域歷史，卻有相同的學術追求，就是追尋區域社會發展內在脈絡的學術自覺。楊國安多年來執着於中國鄉村社會史研究，他認為，「理解鄉村，就是理解中國」（頁1）。持續將關注點放在兩湖地區的鄉村社會研究上，其已出版的《明清兩湖地區基層組織與鄉村社會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獲得學術界的好評。

《國家權力與民間秩序：多元視野下的明清兩湖鄉村社會史研究》一書是楊國安在博士論文後關於鄉村社會史新的研究成果。本書分為五章，前後兩章為緒論和結語，中間三章分別論述了兩湖地區的宗族社會、水利和鄉村控制體系，以鄉村社會與國家的互動關係為中心，選取了一系列個案，多元展示明清時期兩湖鄉村社會。

第一章緒論，作者交代了選題的意義和緣起，做了詳盡的學術史梳理以及所用史料、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的說明，闡明研究旨趣。在這一章中，作者十分強調田野考察對本書寫作的重要性，也在理論上對田野文獻的解讀做了說明，誠如作者所言，該書是他近十年來的田野階段性總結。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僅做好了國內外學術史的梳理工作，還將有關「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的研究路徑的反思進行了分析，認為「集權國家對鄉村社會的部份管